



日本中國學文庫

王晓平◎主編

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日〕小川环树◎著

周先民◎译



中華書局



日本中国学文萃

王晓平◎主编

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日〕小川环树◎著

周先民◎译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日)小川环树著;周先民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5

(日本中国学文萃)

ISBN 7-101-04641-X

I. 风… II. ①小…②周…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8444 号

书 名 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

丛 书 名 日本中国学文萃

著 者 (日)小川环树

译 者 周先民

责任编辑 孙文颖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 1/4 字数 216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41-X/I·615

定 价 23.00 元

总 序

王晓平

日本人(包括从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迁徙到列岛的人们及其后裔),至少从我国南北朝时代便揭开了研读中国典籍的历史,而伴随中国文化进入日本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诸如写经抄书、创造假名、官中讲经、发明训读、朗咏流行、设明经文章诸科博士、藏典修史等等,构成了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壮观的奇景。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就着自身。不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从广义上讲,日本人研究中国,几乎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岁月,但学界真正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中国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

长达一千五百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尤其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全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方法和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联系,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联系敏感、紧密而又牢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日本人对中国的研究与中国自身的学术研究最大的不同,就



是主导这门学问的根本课题,是岛国日本如何面对大陆中国。它们不仅植根于异质的文化土壤,从属于日本文化体系,反映或者作用于当时日本的包括民族主义思潮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在日本学界获取评价,而且根本目标在于发展日本文化。所以尽管它们有时与中国本土学问面临着同一对象,然而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和价值。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构成世界的学术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体系,发挥着不同的文化功能。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离不开一个“近”字。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资料库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阅读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殊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学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两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在日本,对日本古代学术文化的研究,常常不能与对中国的研究一刀两断,再加上现代学术谋求沟通的大趋势,便使得日本中国学者,例如内藤湖南、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的著述的影响超出了中国学的范围;另一方面,某些研究日本学的著述,例如明治时代的民俗学家、最早的环境保护运动力行者南方熊楠,有“知识巨人”、“时代代言人”之称的加藤周一,“文化功劳者”称号获得者



中西进等人著述中涉及到中国学的部分,也都有一读的价值。

日本近代以来在某些研究条件或手段上不同于中国本土,日本学人多重实闻亲见,不尚空谈,长于细读深究。他们在某些领域,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中外关系史、艺术史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迪。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受中国文学的热点,如《文选》、《白氏文集》、《唐诗选》、《古文真宝》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学人多以“他山之石”、“邻壁之光”来强调这种关注的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学术界又从很早便有了对盲目追随日本学人态度的批评。早年章太炎先生对这种态度给予的辛辣讽刺,虽不免言之有偏,却仍不失警戒之功。前辈学者对于当年那些所谓“支那通”的揭露,更不该忘记。在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展开系统研究的时候,仍有必要反对任何形式的食而不化与人云亦云现象,强调中国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统一,葆有学术自信和识别眼力。

今天,更要看透那些变样翻炒“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的所谓“中国通”,他们往往将历史和现实作短线连接,凭借现代媒体和出版业,朝论夕改,张大偏见,仅就学术手法而言,也实不足为训。应该说,这些人虽然不是日本中国学界的主流,但是他们头上也顶着“大牌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和“社会名流”的帽子,近年来忙不迭煽乎所谓“厌中”(讨厌中国)情感,就很有些拉着舆论走的能量。

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价值,绝不



止于“借鉴”，也不应该停留在“此优彼劣”的结论上。对日本来说，日本中国学是日本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某一时期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形象、中日关系。日本的知识界，往往通过它们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专家们，以及有些并非专门研究中国的思想者写的关于中国的著述，对短期或者较长期的社会思潮，有时甚至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都起过某种作用。言说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及民间话语等共同营造着中国形象，而其中学术话语的影响则更为长久深远。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著作来了解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途径。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得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总之，在中日文化双方不能不互相正视的今天，对待格外重视师承流派、积淀深厚、做派繁复、多变多样的日本中国学来说，草草一瞥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原始察终，辨源析流，叩同问异，进而学会平等地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学术对话。既是对话，那当然不是只“知己”就行了，还必须“知彼”，而且不是一般的“知”，而是要深知熟稔。所幸我们已经有了《日本中国学史》、《日本汉学史》等专门的著述，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中国学乃至国际中国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国际文化交流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吸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联系。在这



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为了推进国外的日本学研究,十多年以前,日本便建立了对外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最近又在法政大学中设立了国外日本学研究基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国际日本学研究展开分析。以此反观我国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有些人多只看到那些操着怪腔怪调汉语的外国人在该国学界没成什么大气候,又爱发些对中国隔靴搔痒的议论,就轻看国际中国学研究的意义。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工作的紧迫性。

读书或可睹人。推进学术交流,化解误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品书与人员交流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阅读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述说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期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化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领域更有用的思想资源。

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有些日本学者抱怨中国学者对日本存藏的中国文献抄本、刻本评价过低,而实际原因是这些资料一般中国学者很难看到。面对涉及各类学科的日本中国学著述,切实了解它们的最好方法无疑是阅读原著,而且是系统阅读,因为翻译有时难免会模糊两种文化的细微差异。然而,在很多有兴趣的学人还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翻译就显示着特殊的必要性。

我们选择一些篇幅不长、适于阅读的名篇名著、新人新作介绍给读者,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日本中国学的多种面孔。我们在坚持学术规范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学术研究的个性化与多样化,这些研究和写作方法的异色,或许能帮助我们扩大眼界。



我们这套丛书，没有选择像斯波六郎所著《文选李善注所引古文尚书考证》，或者太田次郎所著《以旧抄本为中心的白氏文集本文的研究》那样大部头的专著，它们学术价值很高而读者面很窄。这些书很重要，等条件具备，也应该译介过来。我们先要做的，是希望读者能认识一批比较好接近的客人，也就是一批学者为非中国学专业知识分子写的书。

日本一些研究中国学的名家，很重视为一般读者写书。吉川幸次郎曾提出让学问回归大众的口号，白川静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强调在孤诣独往苦苦求索的同时，要努力使学问返回到“一般”，即回报于社会。像青木正儿等人文笔之好，在学界早有定评，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学术随笔脍炙人口，几十年来一直是书店的畅销书。

我们选择的书目，除了几部新人新著外，都是“大家”写的“小书”。或侧重其保留中国文献资料的价值，或侧重对中国本土研究的补阙，或侧重于对中日关系研究的历史作用，或侧重于其在日本学界的影响。取其一点，不必求全，积少成多，不拘一格，兼顾学术性与可读性。通过这套丛书，读者便可陆续与那些久闻其名而未见其文的好友见面，共享日本中国学之景观。

序 言

山本和义

小川环树(字士解)先生(1910~1993)是20世纪日本中国学研究领域里最为杰出的学者之一。先生在大学讲台上虽然主要只是教授中国语言学和文学,但是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阔,不但横贯传统分类的“经、史、子、集”,而且在有关日本汉学、汉文学研究方面也都有大作传世。“博雅之士”的称号,对先生来说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

先生1910年生于京都,父亲名小川琢治,母亲名小川小雪,先生是他们的第四个男孩子。小川琢治是日本现代地理学草创时期中卓有成就的京都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京都大学)教授。继父亲之后,先生的二兄[贝冢]茂树、三兄[汤川]秀树又于同一时期担任京都大学教授,前者为中国史学的一流大家,后者则为著名物理学家,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先生年幼时,祖父小川驹橘尚健在,祖父的教诲对先生人格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先生的祖父虽是江户时代纪州藩(今和歌山县)武家出身,但又曾在福泽谕吉创设的近代日本教育机构的嚆矢——庆应义塾学习过英语学。此时他已退隐家中,与先生一家起居与共,朝夕相处,并实际上成为孙辈们的“素读”(不作解释,只是照字面朗读汉籍)业师。“素读”这种教育方法,过去曾广为流行,但随着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完



善,当时已近乎绝迹。驹橘本人在学习英语学之前,业已修得极高的汉学教养,他果断采用传统的教育方法,对年幼的孙辈们精心传授了长期以来成为日本文化支柱的汉学。《四书》是先生“素读”的主要内容,先生后来回忆上课情景时说:“这些汉籍课本放在我们面前,祖父坐在对面(实际上他看到的字都是反的),流利地领读,我们则一句句跟读。”先生后来之所以走上中国学的研究道路,与祖父用“素读”法进行的启蒙教育,以及父亲以中国历史地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分不开的。

先生从设在京都市的第三高等学校(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师从青木正儿、仓石武四郎、铃木虎雄等教授学习中国语言学和文学。其时京都大学已经成为全日本中国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水平也最高。先生天生资质本来就出类拔萃,而京大优越的学习环境,则使其潜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上述业师中,对先生影响最大的是铃木虎雄(号豹轩)教授。铃木教授除了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注释方面留下了大量论著之外,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先生对铃木教授人格与学问的衷心仰慕之情,终其一生不曾有丝毫衰减。他俩的师生关系堪称完美,我作为先生的受业弟子,也常常因此而受到莫大的感动。

先生以关于《儒林外史》的研究作为毕业论文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旋即考入本校研究生院继续深造。1934年春,先生前往中国北京留学,成为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的旁听生。先生在北京的留学生活丰富而充实,不仅有幸亲耳聆听了魏建功、吴承仕、孙人和、钱玄同等名教授的教诲,并且也获得了直接师从语言学专家罗常培的机会。不言而喻,先生在学问上所得极丰。学问之外,先



生在精神上也有着极为珍贵的收获，这就是那些不知姓名的中国人所显示出来的友善心肠带给先生的感动。先生是从神户港出发开始中国之旅的，五天后抵达天津的外港塘沽，初次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先生三十年后在《我所遇到的中国人》一文里，回忆当年经历时写道：

海关的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我看到排在前面的人们过关时，行李箱被打开了，看上去检查得相当仔细。我等在后面，对此已有了心理准备。终于轮到我了，海关人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中国？”我回答说：“我是来留学的。”那人听罢脸上立刻浮现出笑容，说：“啊，你是来求学的，过去吧。”说完，几乎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就用粉笔在我的箱子上画了个圆圈，让我通过了海关。遇到这种优待，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拎上行李，一边往停车场赶去，一边反倒感到有点不自在。与此同时，有种感慨在我脑海中突然升起：啊！我来到看重学问的国家了！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中这种感慨如涟漪越荡越大，逐渐漾满了我的全身。我当然连那个个子不高、稍显肥胖的海关人员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他的微笑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个微笑似乎预示着我一年的留学生活将会一帆风顺。当晚，我平安抵达了北京车站，此后我甚至一次也没遇到过令人不快的事情，至少可以说，与我接触的那些中国人，从未让我产生过不愉快的心情。我当然也因不小心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挫折，但那大体上都是由我的不是所造成的。从总体上看，不能不说是非常幸运的。

在中日关系已经持续恶化的当时，那些中国人却用自己的友善举



动,使先生度过了愉快的留学时光,我亦为此感动不已,并从内心深深地感谢他们。我以为先生对文章里所记载的那些中国人的美好记忆,长期以来一直贯穿在先生的中国学研究中,始终存在于先生的心灵深处。先生晚年将极大心力倾注于对北宋文人苏轼的研究,或许就含有通过苏轼的博大胸怀和崇高人格来表现他上述感情的美好愿望。

留学第二年的春天,先生踏上了江南之旅。也就是在这次旅行中,先生在杭州拜访了郁达夫,请他给鲁迅写了封介绍信。通过他的介绍,先生在上海的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见了面。先生在日记里记下了对鲁迅的第一印象,“身材不高但目光敏锐,神态举止充满着自信,说话则直截了当”,先生还描写了鲁迅总是手不离烟说着日语的情景。包括后来在苏州留学期间在内,先生曾有幸多次获得过与鲁迅对话的机会。

结束江南之旅后,先生回到了北京。当年九月,先生把留学的地点改在了苏州。关于选择苏州的理由,先生在《我所遇到的中国人》里说:

我将留学地点从北京迁至苏州的理由,其实非常单纯。北京几百年来都是首都,其语言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它的语音,已经成为全中国的标准语音,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在日本提起学习汉语,即意味着学习北京语言。可是现在中国人口多达五亿,他们所说的话里当然含有各种方言。我对语言史尤其是音韵史一向持有兴趣,总感到应该在北京话之外至少再学一种方言。留学前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仓石先生,仓石先生建议我去学苏州方言;在北京留学期间我反复权衡的结果,也还是觉得学苏州方言是最好的选择。



先生谦虚地说“理由”“非常单纯”，其实这是先生在深思熟虑之后所作的决断。它告诉我们，此时的先生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语言研究的将来，所以他要紧紧抓住留学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在苏州留学期间，先生跟着一个青年，以教其日语作为交换的方式，大约学习了八个月的苏州方言。先生在苏州度过的这些日子充满了快乐，直到晚年还时常怀念起苏州的风土人情。

1936年，先生结束留学生活，满载而归。两年后登上东北帝国大学（现东北大学，位于仙台市）讲坛，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直至1950年转任京都大学教授为止。在战中战后那些极其艰苦的日子里，先生黽勉劬劳，在学术园地里勤耕不辍。或许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先生的研究生涯中最为充实的时期。

1950年先生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院教授后，讲授中国语言学和文学。翌年，先生以论文《明清小说史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直至1974年退休，先生执京都大学文学院教鞭二十四年，为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事业培养了很多后继者。其间，先生被推举为1969年度、1970年度的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履行了领导日本中国学界的崇高职责。退休之际，先生又亲自主持了两个研究会，为栽培年轻的研究人才倾注了大量心力。这两个研究会分别是研究苏轼诗的“读苏会”、研究中国语言学的“均社”。在先生的主持下，两会的研究活动一直定期举行，直至先生重病在床才不得不停止下来。仅从此事也可以看出先生为了中国学的发展，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89年，先生又被选为日本学士院会员。

先生一生治学不辍，著作等身，限于篇幅，无法将这些学术成果悉数介绍。这里仅将先生横贯“经、史、子、集”的学术成果中的



著作部分,按照出版年代的先后排列如下,庶可窥其煌煌成就之一斑。其中合著者加*号。

《毛诗抄》一、二* 《吴船录》(范成大,日文译注) 《三国志》一~十(《三国志通俗演义》,日译)* 《汉文入门》* 《唐诗概说》(收入《中国诗人选集》) 《苏轼》上、下(收入《中国诗人选集二集》,日文译注) 《中国古典诗集》(收入《世界文学大系》)* 《苏诗佚注》上、下(编著)* 《宋诗选》(日文译注) 《新字源》(汉日辞典)* 《三国志——通俗演义》(日译)* 《老子·庄子》(收入《世界名著》,日译)* 《中国小说史研究》 《史记列传》(收入《世界古典文学全集》,日译)* 《唐诗选》(收入《世界文学全集》,日文译注)* 《史记·汉书》(收入《世界文学全集》,日文译注)* 《苏东坡集》(收入《中国文明选》,苏轼文,日文译注)* 《王维诗集》(日文译注)* 《风与云——中国文学论集》 《陆游》(收入《中国诗文选》,评传) 《苏东坡诗选》(日文译注)* 《唐代诗人》(编著)* 《中国语言学研究》 《史记世家》上、下(日译)* 《中国的汉字》(收入《日语的世界》,编著)* 《苏东坡诗集》一~四(日文译注)* 《中国散文》(收入《中国诗文选》)* 《注解千字文》* 《谈往闲语》 《论语徵》一、二(日文译注) 《毛诗抄》一~四(校订)* 《必携汉和辞典》* 《小川环树著作集》一~五 《吴船录·揽辔录·驂鸾录》(范成大,日译)

通观以上书目,不难发现其中合著者不少。在这些合著中,有一部分是先生与他的同辈学者分头执笔完成的,但更多的是先生与其弟子共同合作的结晶。先生总是把合作过程作为一个课堂,



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给予弟子们严格的指导(笔者即从先生的这些谆谆教导中受惠良多)。

关于先生的治学特点,我曾在《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三卷的“解说”里写过一段话,现录在下面:

用“文如其人”来形容小川环树先生的治学特点,实在是恰如其分。先生学术成果的数量,非“庞大”二字不足以形容。然数量虽巨,却没有一篇是敷衍草率之作,皆是先生用“心”结撰而成,每一篇都让我们想起先生崇高的为人。先生的文章读起来平易自然,如流水般通畅无碍,行止自如,可一字一句都植根于深厚的学殖。作为一个学者,先生从不炫耀学问,可是与学问无缘的文章,亦与先生无缘。可以说,先生的一生,就是一个纯粹的、惟学问是求的学者的一生。

本书从先生庞大的学术成果里,选译先生有关诗及诗人的论文,兼及其他。作为选目者,我非常希望本书能够成为一座桥梁,为中国读者理解先生的学问发挥一些作用。

附记

笔者在写作这篇序言时,参考了《小川环树著作集》第五卷卷末所附的兴膳宏氏撰写的《解说》、《小川环树年谱》及《小川环树编年著作目录》,特此致谢。

2004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山本和义
-----------	------

风与云——感伤文学的起源	1
--------------------	---

“风景”在中国文学里的语义嬗变	25
-----------------------	----

《敕勒歌》的原语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43
--------------------------	----

《唐代诗人》序说	57
----------------	----

诗语与诗人的气质——以刘沧为例	85
-----------------------	----

书店与抄写——诗人的生活	99
--------------------	----

李白作诗年代臆说	103
----------------	-----

“吾道长悠悠”——杜甫的自觉	115
----------------------	-----

陶渊明的挽歌

—— 一海知义《中国诗人选集·陶渊明卷》跋	125
-----------------------------	-----

落日的观照

—— 都留春雄《中国诗人选集·王维卷》跋	129
----------------------------	-----